总　论

在人类跨入 21 世纪之际，世人的目光正越来越聚焦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带——东北亚地区。其理由可谓极其明显：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潜力的日本、韩国、中国及其港、台地区云集在这里，当今世界多极力量中的中、美、日、俄四大国的利益在这里复杂交错，当今世界两大潜在冲突热点之一——朝鲜半岛也在这里(另一个在中东)。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格局与秩序如何演变，其和平与发展能否得以持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地区的未来命运，并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东北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就位于这一地区，东北亚如何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及能否按既定蓝图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既然东北亚如此重要，那么中国十分关注东北亚问题、中国的学术界格外重视东北亚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中国东北亚研究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曲折、几经演变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则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不断进展的大背景和东北亚研究自身发展的小环境，推动着中国的东北亚研究渐趋走出国门，其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近年来，中国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发展情况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其进行一次阶段性总结，从信息交流的角度对其进行一次基础性调研，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基于以上现实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于 2000 年夏季成立了“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和对外交流情况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本书就是这一课题组的最终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是由若干重点案例研究报告和东北亚研究机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所组成的。在进入这些案例分析和机构调查结果之前，在此拟首先就本课题组考察中国东北亚研究和对外交流情况的总体视角、基本思路作一概观。

一、中国与东北亚

东北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更是一个国际关系概念和地缘政治概念。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东北亚是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是直接关系到其核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认识东北亚，怎样处理东北亚事务，是其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课题之一。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岸。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近 13 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仅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将近 4000 年之久。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 1998 年底已同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约占总人口的 92%，55 个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

的 8%。

在以主权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处在一个周边环境、大国关系、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等多层次因素相互交叉的国际环境结构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营造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不断发展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之一。

从中国的周边环境看，在陆地边界，中国与 15 个国家接壤，即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南和西部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东北接连俄罗斯,正北方为蒙古，西北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邻。另外,在东部和东南部,中国隔黄海、东海、南海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 6 国相望。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也程度不同地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着影响，其中，尤其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在这一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的周围地区逐步形成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 4 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次区域。其中，位于西太平洋一带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与北美、大洋州一道构成了环太平洋或‘亚洲太平洋’(简称‘亚太’)这一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区域。

东北亚是构成中国周边环境的最重要的次区域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地区呈现出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多见的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东北亚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在 21 世纪也将依然与西欧、北美三足鼎立而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东北亚成为冷战遗留结构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很可能是最具爆

发冷战与热战危险的主要地区之一。鉴于这一双重现实，中国东北亚政策的基点是：发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国情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中国的东北亚政策除了把对任何国家都普遍发生作用的一些内外因素考虑在内以外，还要受到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自身特殊国情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国情，成为中国东北亚政策的设定上限与下限、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基本前提。

一个国家的国情，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得到鉴别。在东北亚国家当中，可与中国进行国情比较的国家有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其中，日本是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和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烈的政治大国志向的国家；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超级大国，其重心在于欧洲一边，其经济正陷于困境而尚未能自拔，其在冷战后东北亚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明显衰落；朝韩双方和蒙古则在国土、人口、经济实力和对外影响方面均远不及日本。因此，从国情的相对可比性和进行比较的现实意义等角度看，在把握中国的国情及其东北亚政策的背景条件方面，日本是一个最适于进行比较的对象和参照系。

从以下几方面指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是十分不同的，这些差异必然反映到中日各自的东北亚政策以及中日关系之中。

——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约 25 倍，人口是日本的约 10 倍，国土与人口的“超大型”规模既成为中国东北亚政策的强大后盾，但同时也往往成为限制其对外回旋余地的制约因素。

——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于 2000 年才达到日本的约 1/4，人均 GDP 则更是日本的 1/40 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是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低起点出发的，其 13 亿人的脱贫、致富进程可谓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过去 20 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方面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有 10 年之久停滞不前，中国则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势头，其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经济水平要比按汇率计算结果要高一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出现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造成了一部分人率先进入“中等发达型”生活方式的趋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亟待解决的消除贫富、地区差距问题。

——中国的国防开支约为日本的 1/3，却要保卫 25 倍于日本的国土，而且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四面环海的日本复杂得多；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依托、并正不断扩充最先进的常规军备，中国则在冷战时期确立了核大国的战略地位，以此弥补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中日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地理、物质及心理承受能力和脆弱性方面也是各有长短。

——中国是一个有着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日本则是一个没有正式认定国内少数民族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国内治理任务在总体上要比日本复杂得多；以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构成为基础，中日两国对待国际化潮流的开放心态也表现出十分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中国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应超越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把所有国家的平等、互惠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的东北亚政策则尚在很大程度上固守着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模式。

——迄今为止，中国已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且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日本的外交政策则始终受制于“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框架，其 80 年代以来的大国外交努力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受到美国因素和历史问题因素的制约。

从以上一些基本条件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相当不同,而如果把中国与俄罗斯、朝韩双方、蒙古等国相比,则将看出其相互间的国情差异更大。这些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东北亚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特点与风格。从这些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东北亚政策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三大基本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北亚的天然联系、中国东北亚政策的基础条件、与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关联，这几方面的因素就构成了中国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必然缘起和蓬勃发展的背景和动力。

二、“东北亚”的定义

正如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基本用语源于西方一样，“东北亚”这一概念也是在其中历经曲折而出现的一个次区域称谓，其演变过程本身就反映着一部“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直至二战前后，西方列强曾长期以“远东(far east)”这一概念来称呼西北太平洋这一位于遥远的东方尽头的地区。翻开二战史册，随处可见“远东”这一概念曾是对这一地区的主要称谓：1946 年初期成立的同盟国对日管理机构叫作“远东委员会”，1960 年新《日美安全条约》中有一个“远东条款”,美国国务院有个“远东司”,1948 年 1 月 6 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的“防波堤”演说等也以‘远东’为对象地域。

二战时期，日本曾以“大东亚”一词称呼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并企图永久吞并这一地区，从而使这一概念带上了浓厚的负面色彩。

二战以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概念逐渐流行开来,“远东”一词的使用频度则日趋减少。如今,人们通常把俄罗斯的东端称作“远东地区”,而对其他亚洲部分则很少再以“远东”一词称之。

在战后时期,人们逐渐把‘东亚’和‘东南亚’区分开来,前者专指西北太平洋地区,后者专指西南太平洋地区。此后再经演变,“东北亚”一词逐步取代‘东亚’而成为称呼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概念,“东亚”一词则演变成为称呼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概念。至此,“东亚”概念就其地理范围而言,与二战时日本曾使用的‘大东亚’概念变得十分相似,从而成为一个广义的‘东亚’概念。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这种广义上的“东亚”概念的地理界定变得日益清晰,并广为各国政府、社会及学界所接受。90 年代初期马哈蒂尔首倡、东盟予以接受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设想,就十分明确地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国都包括在内。1995年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的‘东亚战略报告’的对象地域,也是指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近年来出现的东盟加中日韩对话机制(“10+3 框架”),其成员就是“EAEC 设想”曾经计划吸收的各国,它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所有主要东亚国家已经参与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机制。

“东北亚”概念的上述演变进程,并不意味着人们围绕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运用已不存在任何差异。相反,迄今为止,往往依然可见各种不同的“东北亚”或“东亚”概念及其地理范围界定方式。

第一种界定方式是以“东北亚”概念指西北太平洋地区,以“东南亚”概念指西南太平洋地区,以‘东亚’概念作为这两者的

统称，这种界定方式在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领域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由于这种界定方式主要是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概念，其实际运用强烈地反映着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地区合作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东亚”概念中的“东北亚”地区往往与一般所指的“东北亚”的范围并非完全一致。在现阶段，人们所说的“东亚”合作通常指东盟 10 国加中国、日本和韩国，而俄罗斯和蒙古则没有包括在内。这是因为，俄罗斯作为整体被视为是一个欧洲国家，后者则还没有积极参与到东亚事务中来。至于朝鲜，各国都不否认这个国家理应包括在“东亚”合作之内，只是因种种原因迄今尚未能实现罢了。

在地区安全领域，“东北亚”这一概念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意义，这一概念指以中、美、日、俄四大国加朝、韩双方为行为主体的范围，是由“4＋2”组成的“六方安全合作机制”设想的国家载体。这一设想的主要特点，一是非东北亚国家——美国在其中占有了重要一席，二是它与“东盟地区论坛”(ARF)等迄今为止由东盟主导的各种东亚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区别开来，反映着西北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

第二种界定方式是沿用二战后曾广泛流行的方式，即以“东亚”概念来指西北太平洋地区，而不使用“东北亚”概念，这是一个与“东南亚”相对意义上的狭义的“东亚”概念。如今，使用这种界定方式的国家和人士已日趋减少。

这一狭义的“东亚”概念通常并没有把俄罗斯包括在内，因而其内涵实际上专指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

第三种界定方式是以“东北亚”概念专指西北太平洋地区，但在内涵上则把“东北亚”作为狭义上的“东亚”和“北亚”两个地理区划单元的统称，前者指中国、蒙古、朝韩双方和日本，后者指

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这种界定方式基本上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方式。如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世界地图册》也采用了这种划分方式。①

第四种界定方式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各类“东北亚局部经济合作”设想中出现的界定方式,其“东北亚”的地理范围界定不是以各主权国家的整体为单位，而是以各国的实际上参与该地区经济合作的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为范围。

具体而言，这种“东北亚经济合作”涵盖蒙古、中国东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朝韩双方以及日本西海岸地区。

迄今为止，这一地区各国出现了多种局部经济合作的设想和概念，如日韩双方针锋相对地提出的“日本海经济圈”设想和“东海经济圈”设想,其他的有“西太平洋经济合作”设想、“黄渤海经济圈”设想等等,此外还出现了“图们江开发计划”等更狭义的局部经济合作方案。

上述各种不同的地理界定方式，是不同的学科领域、考察视角以及客观需要的产物，从而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因而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标准对这些不同界定一概作出取舍。

另一方面，在理论探讨和外交实践中实际运用“东北亚”概念时，则应事先就这一概念的对象领域作出明确界定，以免造成概念界定与所谈问题相互脱节的弊端。例如，首先应清晰地界定所谈论的是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在谈论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还是局部经济合作问题？所界定对象是自然地理概念,还是地缘政治概念？既然围绕“东北亚”、“东亚”等概念

① 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世界地图册》“亚洲”部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人们在共同探讨这一地区的问题时，必须相互确定对方正在使用的是何种意义上的界定方式，否则很有可能导致概念上的误解和结论上的误导。

三、中国的东北亚研究

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可谓由来已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对远东国际局势的探讨，对朝鲜半岛形势的把握，对日本的研究等等，无不属于广义上的东北亚研究。

如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样，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深受“极左”路线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陷于几近瘫痪状态。经过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由此迎来了全面繁荣时期，东北亚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复兴与发展的新阶段。80年代以来，以中国北方地区几个“点”为中心的日本研究、朝鲜半岛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学科领域迅速恢复并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并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形成东北亚研究的“一条线”，进而逐步向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更广阔的“面”扩展。

然而，东北亚研究毕竟不是对东北亚各国的国别研究及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研究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以多边关系、地区格局、国际秩序等更广泛领域为对象的区域研究，即要研究整个地区的发展规律。

诚然，对日本、朝韩双方、俄罗斯及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属于东北亚研究范畴；但从区域研究角度看，这些国别研究和双边关系研究尚属于基础研究阶段，而不能取代高层次的东北亚研究本身。东北亚研究应是基于这些国别研究和双边研

究之上的、从中对整个地区结构与趋势作出综合与概括的学科。因此，东北亚研究与国别研究和双边研究既紧密相关，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范围和方法。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别研究和双边研究的发展和积累，是东北亚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必要准备。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东北亚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国别、双边研究逐步向次区域研究发展的过程。这一趋势也与东北亚问题本身的逐渐突出化以及国际上东北亚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特别是 20世纪 60 年代、70年代和 80年代，日本、韩国、中国相继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全球性的地区经济合作潮流，90年代以来建立地区共同安全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渐增长，这些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东北亚研究的肇始、勃兴和发展进程。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对作为整个次区域问题的“东北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及相关的对外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首先，冷战的结束大大改善了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使地区内各国间经济、文化和人际交往急速增加，给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研究与对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其次，中国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为全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提供了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必要条件。

再次，东北亚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的现实需要，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东北亚研究及对外交流的重要性。例如，90 年代初期以来“图们江开发计划”的制定在中国东北部掀起了东北亚研究热潮；“三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北亚大协作区设想”、“日本海经济圈”、“黄渤海经济圈”等设想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地推动了中国学者对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研究和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势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东北亚安全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高潮。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推动了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日趋深入开展，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本身的规律则推动了 NGO/NPO 形式下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发展。

最后，日本、韩国、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的各类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纷纷加大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资助力度，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东北亚问题研究与对外交流得以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及对外学术交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1. 各领域的研究和对外交流呈现出“先经济、后安全、再环保”依次出现高潮的波浪式发展趋势。

90 年代初期，东北亚问题的研究与对外交流热潮首先是从“图们江开发计划”等经济合作引发的。再往后，90年代中期地区安全形势重新趋紧使东北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外交流成为新的热门，近年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大为提高则促使环保问题为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中日益重要的领域。

2. 各不同领域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呈现出了“逐步深化”和“重点转移”两大特点。

“逐步深化”指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能力的提高，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逐步提高，并向研究活动系列化、研究成果丛书化、交流对象多元化等方向发展。

“重点转移”指随着各时期的内外环境及客观需求的演变，各领域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侧重点也在发生相对转移。以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领域的研究与对外交流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的安全概念的探讨为重点，90年代中期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及其模式方面，90年代末期则主要侧重于大国“伙伴关系”与地区政治安全方面。

3. 东北亚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东重西轻”、“一点一线”(“点”为北京，“线”为以京、津、沪为主线的东部地区)的特点，其研究领域分布则呈现出东北、北京和其他重点地区各有侧重和优势领域的分工体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些地区对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客观需求和研究条件的程度密切相关。

例如，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省和辽宁省在东北亚经济合作领域的研究与对外交流十分活跃，其原因既有该地区对东北亚经济合作抱有较高期待值的因素，同时也与该地区在日本、朝鲜半岛及俄罗斯的研究方面均具有较雄厚的人才与学科基础有关。北京在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外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则来源于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信息、人才及条件上的优势。

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一样，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在目的和功能上包括基础与应用、学术与对策等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所组成，其研究活动和成果兼有着对内与对外、对政府和对社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在推动政府决策、提高社会各界的认识、学习国际经验和对外传播我国的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在基础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等方面都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已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还远没有达到值得故步自封的地步，与中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不断扩

大对外经济与文化交往的需要相比更是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迎来 21 世纪第一年之际，随着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目标即将实现，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也正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可以预想，在 21 世纪初期,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迎来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繁荣期。

四、本书宗旨与结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的深入开展，各有关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交流日趋频繁，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发展，人们的视野逐步拓宽，相互交流的质量更加提高。在这一进程中，对全国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情况作一综合和概括并把其结果还原给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已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于 2000 年夏季联合成立了“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和对外交流情况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旨在对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研，为研究界和有关部门提出一项理论概括和信息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领域，“中国东北亚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难以指望靠一项课题来对其每一侧面都进行全面、详尽的探讨。况且，迄今为止这种综合性调研几乎尚无现成的成果作为可资参考的基础。这种情况既给此次调研增添了困难，但同时也给这项工作赋予了基础研究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有鉴于此，此次课题的实施在时间范围上采取了以最近一段时期为主、以通史性概观为辅的方式，在空间范围上采取了把

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即把重点研究机构的重点项目的个案调研和若干重点学科领域的概观相结合，把若干重点研究报告和对全国研究机构的基础调查相结合，以有限的篇幅更有效地反映“中国东北亚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的全貌。

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其中，上篇由以下五篇研究报告组成。

（1）中国的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研究与对外交流情况的研究报告

这篇报告从论述东北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基本特征入手，综合概括了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发展进程，并就其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该报告指出：东北亚是大国最为集中、其战略利益相互交汇的地区，这些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一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着复杂影响；东北亚是富于多样性的地区，文明传统、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的相互交叉碰撞，是影响这一地区政治与安全的重要因素。东北亚政治与安全格局如何演变？对此作出回答，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该报告总结了中国的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发展进程，概括出了全国研究机构分布的“一点（北京）一线（东部沿边、沿海地区）”特点，指出了该领域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阶段”“四个主题”，归纳出了每个阶段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达到的一些共识，提出了“求新”“求同”“求衡”“求和”等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并对东北亚政治与安全中的一大重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了重点论述。

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研究的特点，该报告概括出了机构分布上的“东重西轻”、研究课题设置上的“前轻后

重”研究领域和范围扩大展宽、对外交流走向多边化、研讨活动趋向系列化、学术专著倾向丛书化等特点。

(2)中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与对外交流情况的研究报告

这篇报告从分析全球性经济区域集团化潮流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入手，考察了中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研究的缘起和发展进程。

该报告指出，中国学术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了对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各种地区经济圈设想。这一研究很快就形成了一股热潮,并从学者们的书斋里走进实业界和政府界,形成了官、产、学联动的趋势。

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以来，中国学者先后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比较系统和有所创新、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包括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的缘起、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亚太政策取向等问题，以及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合作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合作的困难和阻力、推进合作的模式选择、合作的特点与前景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等。

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东北亚经济合作尚停留在构想构想，而还没有变成这一地区各国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尚存在诸多障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着重就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提出了各种设想。

该报告概括了有关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机构的分布和发展，就其中的重点学者和重点成果进行了概括，并选择其中的若干重点机构和重点项目进行了个案调查与分析，最后就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的未来作了展望，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

建议。

(3)中国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与对外交流情况的调研报告

这篇报告从中国国内形势和对外研究需要与朝鲜半岛形势的互动关联为主线，对中国朝鲜半岛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发展历史作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

该报告认为，中国的朝鲜半岛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北京、长春、延边地区率先兴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研究国外建设经验的需要，是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研究兴起的背景。

90年代初期，中国的朝鲜半岛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图们江开发计划的实施，使地区经济合作以及朝韩关系问题成为新的研究重点。这一时期研究机构也开始向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等更广阔的地区范围扩展。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朝鲜半岛研究经历了以韩国发展经验、东北亚经济合作、东北亚和平问题等为重点的前期和以朝鲜问题为重点的后期的演变过程。

90年代末期，对韩国发展模式的重新探讨以及对朝韩关系的整体研究上升为研究重点。该报告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主要研究对象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朝鲜——韩国——韩、朝——朝鲜半岛整体”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这一过程伴随着东北亚研究队伍及其研究手法、研究质量日益发展和更新换代的进程。

(4)中国的NGO/NPO的东北亚研究与对外交流情况的调研报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内部开始形成一些NGO/NPO(非政府组织／非赢利性组织)。这篇报告以一些主要机构为案例，探讨了中国NGO/NPO在东北亚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其成就与不足、促进机制和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